

印度华人社区与华裔印度人*

——中印交流史视域下的考察

张 幸

摘 要：华人移民在印度聚居的历史已有200多年，在当时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先后形成新娘市场和塔坝两个华人社区。目前仍居住在那里的华人约有4000人，在较为完整保留的塔坝华人社区，客家人后裔仍沿袭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而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现了人口超过加尔各答华人的新的印度华人社区。基于田野调查基础的考察可以看出印度华人/华裔印度人具有中国与印度习俗混合、兼具中印文化元素的独特身份与文化特征，他们大多未被当地社会所同化，在保留华人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当他们离开印度再次移民海外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携带着具有中印文化元素的混合认同。

关键词：中印交流史 华人社区 华裔印度人 中印关系 身份认同

华人移民群体在印度的聚居始于18世纪下半叶。当时的社会动荡、殖民主义商业活动及其形成的劳动力渠道，引发了华人向印度港口城市的迁徙。至20世纪初，华人移民先后在英属印度首都加尔各答新娘市场（Bowbazar）和塔坝（Dhapa，又称Tangra）两个地区建立了规模化的华人社区，相继成立了多种社团组织及文化机构，延续了各自族群的方言和文化习俗。印度华人数量最多时达到三万人以上，20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16JJD750002）的阶段性生活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冲突后，他们或被遣返，或陆续离开印度再次移民，如今只有约4000名华人移民及其后代继续在那里生活，保留下以客家人为主的塔坝唐人街。印度华人/华裔印度人是印度最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在中印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是被忽略的微小分支，在浩繁的中印交流史整体研究中往往仅能让人匆匆一瞥。但他们作为中印两国近代以来交往的经历者和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近年来已开始被中印学者关注和重视。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文本资料，对他们进行考察并探讨其身份认同建构，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印交流史的研究中对这一独特群体有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一、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形成

加尔各答于1772年被定为英属印度首都，这座港口城市在此之前已成为英国殖民者与中国贸易的海上运输重要枢纽。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等商品通过加尔各答港口海运到英国；作为交易回报的银条等也从这里运往中国。在英国人将鸦片作为印度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之后加速了这种海上贸易，印度的棉花与靛蓝等也被英国人用于交换他们所需的中国商品。加尔各答和广州之间的商贸往来为华人移民到印度定居开启了海上通道，此后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增加了中国通商口岸，促进了中国与印度之间海上移民通道进一步形成。

可以考证的第一位在印度定居的华人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的茶商杨大钊，他被当地人称为阿钊（Atchew）。^①据英国资料记载，杨大钊于1778年来到印度寻求商机，他用茶叶等礼品换取了时任英国的印度总督瓦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信任，以极低的租金

^① 杨大钊的名字在英文资料中有许多不同的拉丁字母转写，最常用的是来源于东印度公司资料中的拼写 Atchew。

得到胡格利河畔 650 比加 (Bighā)^① 的一大片甘蔗地。^② 杨大钊在这片甘蔗地上建起制糖厂，并从家乡招来劳工，开始了华人最早在印度本土的生产经营活动。1958 年出版的孟加拉语小说《唐人街》(Cāy'nātāun) 中，描写了加尔各答华人中流传的关于杨大钊的传说。据传杨大钊在去印度以前，就在广州结识了英国著名商人詹姆斯·弗林特 (James Flint)，由此得到了包括总督瓦伦·黑斯廷斯在内的“加尔各答英国贵族社会的资助”^③。英国资料中也显示出杨大钊的确与当地的英国官员有良好关系，例如在他建立制糖厂后不久，就曾向英国官员求助，认为住在加尔各答的华人引走了他的工人。他在 1781 年的请愿书中写道，应对此事负责的是那些“从商店里逃出来的，留在加尔各答且没有任何明显生计”的华人。^④ 英国最高当局及时作出回应，在加尔各答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公告，告诫相关人员。

从杨大钊的请愿书和英国当局回应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8 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一些华人居住在加尔各答，他们是乘坐往返于加尔各答和广州之间的船只来到印度的。^⑤ 最早关于华人在加尔各答聚居的目击记录者是越南华裔黎文馥 (Ly Van Phuc)，根据他在 19 世纪初的记载，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几百名华人居住在加尔各答，他们大多比较穷，其中一些人建造了供奉中国神祇的关帝庙。^⑥ 英国人阿查利 (Chaloner Alabaster) 于 1857 年在香港的贸易总署 (Superintendency of Trade) 担

① 比加，面积单位，不同地区所指面积有所不同，在印度西孟邦，1 比加大约等于 1333.33 平方米。

② Basanta Kumar Bose, “A Bygone Chinese Colony in Bengal”,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47 (January-June), 1934, p.120-122.

③ Xing Zha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lcutta*, Halle an der Saale: UVHW, 2015, p.74.

④ Basanta Kumar Bose, “A Bygone Chinese Colony in Bengal”,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47 (January-June), 1934, p.6.

⑤ Xing Zha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lcutta*, p.61; Pradip Sinha, *Calcutta in Urban History*. Calcutta: Firma KLM, 1978, p.52.

⑥ Claudine Salmon, “Bengal as Reflected in two South-East Asian Travelogu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Om Prakash and Denys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 1500-1800*, New Delhi: Manohar, 1999, pp. 383-402.

任翻译时，受命陪送被英军由广州押解到加尔各答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叙述在加尔各答有一个约500人的广东人和客家人的聚居地，这些华人从事制鞋、木工、贩卖鸦片等经济活动，除了拥有兼具聚会场地功用的关帝庙，华人木工还修建了一座天后庙。^①

19世纪上半叶开始，在南亚地区的孟买、卡拉奇等其他港口城市也有华人移民定居，但始终没有像加尔各答这样形成规模化的华人聚居地。19世纪下半叶中国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土客冲突，使更多华人移民来到加尔各答。^② 190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加尔各答有1640名华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华人移民到印度的数量持续增长。根据英国的印度情报部门在二战结束时的统计，定居在印度的华人移民至少有26250名，这个数字不包括当时中国国籍的华人，以及因战争影响海运航线受阻而滞留的华人海员。^③ 印度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新娘市场和城东的塔坝地区，分别形成了以广东人和客家人为主体的华人社区，呈现出南亚地区唯一的“唐人街”景观。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统计资料显示，印度华人社区的居民中约有80%来自广东，其中梅县的客家人占比最高（43%），其次是四邑地区的广东人（30%），其余来自南顺、东安、会宁等地区。^④

二、印度华人的主要职业及其特征

（一）广东木匠与木工厂主

广东移民是新娘市场华人社区的居民主体，木工是他们的主要职

① Chaloner Alabaster, "The Chinese colony in Calcutta", *Calcutta Review* 31.62, 1858, pp. 369-370. Reprinted in P. Chaudhury and A. Mukhopadhyay eds., *Calcutta: People and Empire: Gleanings from Old Journals*, Calcutta: India Book Exchange, 1975, pp.15-20.

② 此处主要指1855至1867年间发生在中国广东地区的土客械斗。

③ Anon (n.d.), "Chinese Activities in India: 1941-1946", *Chinese Nationals*, File No. 236-239 [12]; Serial No. Calcutta. Kept at the West Bengal National Archives, Shakespeare Sarani, Calcutta.

④ 余绪贤编著：《印度锡兰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家乡就已掌握木匠技能，早期受雇于加尔各答等印度城市的船运、铁路公司以及家具厂。广东木匠在工作中以勤劳、亲和、手艺精湛著称，得到当地印度人和英国人的信任。在学会英语和印度当地语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从大型木工厂和其他公司获得分包合同，负责室内建筑、家庭及办公家具制造。

英殖民时期，由于加尔各答等地港口与远东地区海上贸易交往频繁，船运公司往往利用这些港口船坞就地对船舶进行维修和保养。在港口从事此类工作的广东木匠很受欢迎，能获得较高报酬。20世纪50年代，西孟加拉邦的胡格利码头仍有300多名广东木匠在船坞工作。在木匠群体中，有不少人从打工者、包工头逐渐成为工厂主，加尔各答市区一度有20多家广东人开办的木工厂。^①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对广东木匠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人被驱逐出印度，在码头工作的华人大多被雇主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而解雇。只有少部分人留在印度开办了小型木工坊。其中，陈炳光经营的广东木厂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成为加尔各答有代表性的华人木工厂，承担了市内多家大型酒店和电影院的室内装修，包括丽兹酒店（Ritz Hotel）和米高梅电影院（Metro Cinema）。如今，加尔各答仍有少数华人在经营木工企业，但与20世纪上半叶曾有的规模相比，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存在感显得微不足道。

（二）客家鞋匠和制革厂主

印度的客家移民以其精湛的鞋匠手艺闻名。与广东人不同的是，客家人在移民来印度以前，并没有特定擅长的职业技能。除了个别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二次移民从事过制鞋，大多数客家移民是在来印度后开始学习这一技能的。^②20世纪初，加尔各答的客家人移民从城中陆续迁居到东郊的塔坝地区，除了从事制鞋，还在那里买下了与制鞋业

① 余绪贤编著：《印度锡兰华侨经济》，第43页。

② Jennifer Liang, "Migration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Calcutta Chinese: An Insider's History", *China Report* 43 (2), 2007, p. 405.

相关联的制革厂，开辟了客家华人的新职业。在塔坝形成了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华人社区，成为继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新娘市场之后第二个“唐人街”。

印度教种姓制度把所有与皮革接触的工作者都归为贱民阶层，这无形中为客家移民从事制鞋与制革创造了机遇。^①由于不受当地宗教与种姓制度的束缚，客家人顺利进入了被当地印度人所排斥的制鞋业。在他们意识到印度教认为的与皮革接触者“不洁”的观念不仅有利于自己在制鞋业立足，更能获得在制革业的发展空间后，开始积累资金购买生产皮具所需原料的制革厂，接手了由低种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从事的皮革鞣制工作。在二战以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本丁克街（Bentinck Street）约有一百家客家人经营的鞋店，被当地华人称为“鞋街”。二战时期由于日军入侵中国并占领东南亚，加尔各答等地的华人移民随之大幅增加，这一变化带动了制鞋业的发展。客家人在加尔各答拥有的鞋店达到140家，其中有30家大型鞋店，有些还在孟买设有分店。^②随着市场对皮革制品需求的增加，塔坝的客家华人逐渐变得富裕起来。而由于客家人在文化习俗、职业定位、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塔坝华人社区始终与加尔各答的非华裔居民保持半隔离状态，使这一相对封闭的社区具有较强的群体凝聚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客家人的鞋店和制革厂经营遭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的再次严重打击，随着巴塔（Bata）、卡迪姆（Khadim's）等现代化国际鞋业连锁店的出现，华人鞋店日渐萧条。现在已很少有人关注和光顾手工制鞋，客家华人鞋店也多改为销售机器制作的皮鞋。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组织的呼吁，地方法院判令塔坝的制革厂必须关闭或迁址到政府指定的远郊区域。塔坝的客家人长期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兼具厂房与住宅功能的制革厂中，因此无论制革厂关闭或搬迁，都

① Ellen Oxfi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余绪贤编著：《印度锡兰华侨经济》，第30—31页。

不仅影响他们的经营生计，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模式。

（三）湖北牙医和山东丝绸商贩等其他职业

19世纪末，一些湖北镶牙师移民到东南亚，又从那里迁徙到加尔各答等印度城市。到二战结束时，在加尔各答由湖北天门人经营的牙科诊所有80多家。这些诊所在为华人顾客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因为良好的口碑和低廉的收费吸引来当地的印度顾客。^①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对华人采取的行动限制，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游走式的传统营生，只能选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致大多数人在加尔各答定居。进入21世纪以后，在加尔各答仍可以见到一些祖籍湖北的镶牙师在他们的小型诊所中，用传统手工艺制作安装假牙和拔除腐烂牙齿，甚至还能补牙和做根管治疗。他们以正规诊所一半的收费标准和独特的从业技能，继续得到当地人的认可。^②

山东移民最早约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活跃在印度各地市场，主要从事山东丝绸产品的销售。随着山东商贩在印度人数的增加，山东丝绸同业公会于1920年在印度成立。到了20世纪40年代，来自山东的移民数量增加至约1500人。^③早期的山东丝绸商贩大多是流动性的，后来在加尔各答和孟买，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商铺或门店。二战期间通航受阻，导致来自山东的丝绸供应链中断，一些山东丝绸商不得不改为经营印度和斯里兰卡生产的丝绸产品，另有一些人转行做小规模的手工业生意，开杂货店和小吃店。目前加尔各答等地已经找不到山东丝绸商存在的痕迹，他们在印度的居住时间似乎没有超过两代人，甚至一代就结束了。

餐饮业应该是印度华人经营的最受当地社会欢迎的行业，且没有被特定的华人亚族群所垄断。早在20世纪初，加尔各答市中心新娘市

① 余绪贤编著：《印度锡兰华侨经济》，第34页。

② Amna Rizvi, "Chinese Dentists: An Institution in Karachi", *Daily Jang*, 7 November, 2005.

③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编：《山东籍旅印侨胞概况》，1944年。

场地区的中餐馆就已在当地的欧美居民和印度上流社会中享有盛名。^① 二战期间，从东南亚来印度避难的华人中，也有不少以开中餐馆或茶馆谋生，使这一时期印度中餐馆和茶馆数量增加到150多家。^② 中印边界冲突虽然对印度华人餐馆经营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当地食材、印度香料与中式烹饪相结合而形成的特色美食，已成为一些印度人饮食习惯中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因此，部分中餐馆仍可以维持经营。目前在加尔各答的塔坝地区，客家人经营的新的中餐馆在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了市中心新娘市场地区，也因地制宜，取代了由于环境问题所限而不得不关闭的制革厂，成为塔坝“唐人街”的新景观。印式中餐已逐渐自成体系而成为国际美食新时尚，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断增多的“丁加拉（Tangra）”“印度锅（Indian Wok）”等印式中餐连锁餐馆，都以此类独特的中印结合菜品为特色。

三、印度华人的传统习俗和社区学校

（一）会馆与传统习俗

会馆是历史上中国同乡商帮的特殊组织形式，19世纪上半叶开始，移民到加尔各答的广东人在新娘市场附近按族群籍贯先后建立了多个会馆，命名多与他们的家乡相关联。四邑会馆由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个地区来的移民所建；东安会馆为东莞、宝安地区来的移民所建；南顺会馆是南海、顺德地区移民建立的；会宁会馆则是四会、广宁地区的移民所建立。以广东梅县移民为主的客家人建立了嘉应会馆，归属自己族群的忠义堂。最初这些会馆为了方便联系与服务同乡，作为聚会活动场所和临时客栈，后来还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山庄，即中式墓园，并负责墓地管理。会馆成为华人同乡们婚礼、葬礼和其他大型活动的举办地。这些会馆里还专门建有供奉中国民间神祇的庙堂，通

① Sheland Bradley, "Calcutta's Chinatown", *Cornhill Magazine* 57 (September), 1924, pp.277-285.

② 余绪贤编著：《印度锡兰华侨经济》，第37页。

常被称为“教堂（Church）”。会馆也是华人学校的赞助者。这些会馆与印度华人社区历史紧密相连，使华人移民保持了各自族群的方言和文化习俗，以延续他们华人亚族群身份。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华人社区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和维护费用的短缺，有的会馆及其庙堂日趋荒废，但仍有几个维护使用至今，是华人社区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看报纸、祭拜神祇或参加活动的地方。

印度华人普遍把首位华人移民杨大钊视为他们的集体祖先，并沿袭每年农历新年伊始去他在阿钊坡（Achipur）的墓地祭拜的习俗。这座马蹄形的墓园于2004年由加尔各答历史最为悠久的义兴会馆出资重建。距离墓地不远处，还有一座可能算是印度最早的中式庙宇，供奉着被称为“伯公伯婆”的土地公和土地婆像，相传这两尊像是当年杨大钊在此定居后亲自安放的，被敬奉为在印度华人的保护神。沿袭对杨大钊和伯公伯婆的祭拜习俗，可以看作是华人民间信仰与旅居地族群历史结合后，华人与印度华人双重身份认同的体现。

阿查利在1858年的记载中提及的加尔各答的天后庙由当地广东木匠建造，他描述该庙“维护得很好”，每年都有客家鞋匠和广东木匠组成的“盛大队伍”前来参拜。^①这座庙宇后来经当地华人多次维修，最近一次大修于1999年。他记述中的另一座供奉关帝的中国庙现位于新娘市场的梅光学校校舍，最初由客家人会馆忠义堂所建。^②除了梅光学校外，华人社区的大部分会馆内以及塔坝地区的培梅学校顶层，都有供奉关帝的地方。关帝作为武财神，在华人家中和工作场所被加尔各答华人广为尊奉。印度华人的另一重要信仰现象是观音崇拜，位于四邑会馆二层的观音庙是吸引社区内外信众最多的地方。在华人社区居民家中和工作地点也能普遍看到被供奉的观音像。此外，在会宁会馆

① Chaloner Alabaster, "The Chinese colony in Calcutta", *Calcutta Review* 31.62, 1858, p.383. Reprinted in P. Chaudhury and A. Mukhopadhyayeds., *Calcutta: People and Empire: Gleanings from Old Journals*, Calcutta: India Book Exchange, 1975, pp.15-20.

② Ibid., pp.370-372.

中有一座阮梁佛庙。阮子郁（1079—1102年）与梁慈能（1098—1116年）都是宋朝时期的广东四会人，被当地人供奉为佛。^①这一民间信仰起源于四会地区，随着四会籍华人移民人数增长也传播至印度。

（二）华人社区的学校

印度最早的华人学校是创立于1920年的印京华侨学校，后来更名为梅光完全小学，由客家移民的嘉应会馆负责管理。1933年中国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教育组通过议案，正式承认该校，并更名为印度加城私立梅光小学。起初，该校的教学语言是客家话，师生也多为广东梅县移民。20世纪40年代开始，梅光学校开始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并增设初中班，一度在西孟加拉北部的噶伦堡（Kalimpong）等城市设有分校。梅光学校与1934年开办的培梅学校以及1943年开办的建国学校一起，构成了印度华人子女文化教育的三所主要学校，均为当地客家移民开办，由塔坝厂商理事会（Dhapa Chinese Tannery Owners' Association）提供资助。学校课程设置经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审批。^②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华人学校的鼎盛时期，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后，保留下来的华人学校多因财政拮据、内部分裂而逐渐衰落，坚持到最后的培梅学校也于2010年关闭。

加尔各答华人社区还有三所为华人子女开办的教会学校。基督教灵粮学校于1962年1月在新娘市场地区正式落成，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华人子女教育机构。它为学生提供从幼儿园到中学共12年的教育，课程设置与印度教育体系一致。^③1970年在塔坝地区增开了一所分校，从而满足了两个华人聚居区的教育需求。灵粮学校之所以能吸引华人学生，不仅由于学校位于他们的居住社区所带来的便利，更在于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能为学生进入印度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或以后向西方国家移民创造条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加尔各答华人尤其需

① 吴大猷编：《四会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91—492页。

② Xing Zhang, *Preserving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ducation*, Singapore: ISEAS, 2010, p.28.

③ Norman B. Rohrer, *Light in the Black Hole*, Tempe, AZ: Grace Community Church, 1991, p.100.

面对融入印度社会或是再度移民的选择，接受英语教育的优势也更为明显。这两所灵粮学校均开办至今，现在是华人社区居民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主要学校。开办于1936年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是一所中文学校，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不再提供中文授课，而开始采用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CBSE）的教育体系，以英语为授课语言。^①

四、华人社区的变化与印度华人/华裔印度人身份认同

建立会馆和开办华人学校等方式，都是印度华人为保留其文化根基与华人身份所做的努力。华人学校从最初使用中国方言授课到后来改用普通话教学，也体现出由地方文化统一回归中华文化的教育目的。随着中印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两国国家关系的变化，移民到印度的华人及其后代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发生变化。

华人移民在到达印度的初期，即使在必要的商业往来中，也更愿意选择与当地的英国人交往，而不是与印度人。这些早期移民大多是希望能在赚钱之后返回中国，把印度视为临时居住地，而不是新的家园。在加尔各答华人社区定居的第一、二代华人移民通过主要在同一方言群体中的内部通婚、文化习俗等，以及半封闭的居住区域，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华人身份，与当地印度人的交往仅限于商业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举家迁徙的华人家庭的到来以及原有华人移民后代的繁衍，加尔各答华人社区发生了深度变革，社区福利、教育等社会事务开始成为社区关注的问题，华人学校、文化协会、中文报馆和其他机构也相继建立。然而，即使在社区生活丰富完善之后，印度仍被视为一个临时的居住地。从加尔各答的华人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教育的既定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

^① 戴子安：《印度半岛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58年，第61—62页。

加尔各答的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社会，是华人保持排他性、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有利土壤，无论是在英属印度时期还是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政府都没有干涉华人在自己社区中的生活。华人开办的学校尽管没有遵循印度的任何教育体系，仍被允许招生授课。然而，官方对华人移民的身份识别却模糊不清。许多华人移民在印度生活了一辈子，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文件，甚至有些在印度出生的华人移民后代，既不明确自己的国籍与公民身份，也不清楚后殖民世界中出现的新的政治概念。英殖民时期和印度独立后的情报档案显示，政府当局将居住在印度的华人视为外国居民，由警察和情报人员负责监视。

在1959年10月的加尔各答人口普查中，有8127名华人登记为外国居民，其中一些是持有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护照的人。还有数千名在印度出生的华人移民后代，由于没有出生证和其他身份证明，而被归为无国籍人。另有一些人自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表示他们在总领馆申领过新中国护照。印度华人个体官方身份的模糊性，以及他们试图维护自己华人身份的努力，都为这一社区带来了此后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恶化后，加尔各答的中国总领馆、中国银行和中国资助的学校都相继关闭，印度政府对华人社区的监控力度随之加强。许多印度华人被指控从事反印活动，而被关押到拉贾斯坦（Rajasthan）邦的德奥利（Deoli）集中营，随后有数千人被遣返回中国大陆。^①仍留在当地的华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的印度政府强制要求他们定期向当地警察局登记和报告，同时施加各种限制，如不允许华人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等。拉菲克·埃利亚斯（Rafeeq Ellias）导演的纪录片《胖妈妈传奇》（*The Legend of Fat Mama*），真实介绍了当时印度华人的凄惨遭遇和无助状况。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加深了印度华人与当地居民之间原本就

^① Shao-chuan Leng and Jerome Alan Cohen,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Jerome Cohen ed., *China's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68-320.

存在的有形或无形的鸿沟，使当地民众对华人群体的怀疑态度加剧。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将对边界冲突的感受与对印度华人的态度完全区分开。受此影响的有不少是出生在印度的第二代华人，这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情感伤痕。无论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印度政府的行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国家。直到1998年，印度政府才允许印度华人入籍。由于受到政治和社会的排斥，仍在当地生活的印度华人大多选择再次移民，陆续迁徙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地谋生。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居民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约150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不到4000人，并导致在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许多华人协会、学校和报馆的关闭。这种影响在位于市中心的新娘市场华人社区更为明显：在华人人口减少的同时，大量穆斯林从其他地区涌入；城市的建设规划与发展，也改变了华人移民曾经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不过，这种变化也促进了生活在该地区的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互动。有些人与非华裔联姻，有些人则渐渐忘记了中文，只能用印地语、英语或孟加拉语交谈。虽然他们在家依然能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但在家庭之外，往往更认同印度的文化、体育及美食。一位来自新娘市场华人社区的年轻人到深圳工作后，发现自己与深圳本地人有诸多不同，只能向同事介绍自己是印度人。

塔坝华人社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这里经营制革厂和其他皮革生意的客家人为自己建造了独特的工作住宅一体化建筑，他们的居住区域通常就在制革厂厂房的上层或周围，而各家建筑群外高大的围墙在这些华人家庭与附近的其他民居间形成隔离。这里的华人很少外出，也很少与附近或其他街区的居民交流。华人的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与居住环境限制了他们与加尔各答大多数印度教居民之间的交往。塔坝的客家人更加强内部通婚，保持传统和文化习俗，抵触被印度社会同化。即使能接受印度的小吃、电视或电影，他们也会与当地的印度人保持距离，并严厉批评那些与异族通婚的人。如今，塔坝华人社区保留相对完好，仍向世人展现着唐人街风貌。在笔者田野调查的问卷

中，不少加尔各答华人会把血缘、祖先、汉语能力、文化习俗和信仰作为华人身份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同时也会自称为印度人。对他们来说，印度人的身份来源于他们出生在印度的事实，或来自他们的印度公民身份。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华裔印度人”或“印度华人”。这样的称呼在加尔各答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出生在印度、可能拥有印度公民身份的华裔，或是少数与印度人通婚的华人移民后代。

20世纪70至80年代是印度华人移民海外的高峰期，远离印度政府对华人的不公待遇和就业限制、寻找更好的前景和生计，是印度华人自愿选择重复祖辈历史再次移民的主要动因。加拿大城市多伦多是他们最为集中的移居地，印度华人起初都居住在多伦多市中心东北部圣詹姆斯镇（St. James Town）的政府公租房中。由于这是一幢红色建筑，人们普遍将它称为“红楼”，视为加拿大印度华人历史开始的地方。有学者认为“圣詹姆斯镇的社会生活可能就是塔坝生活的部分复制”。^①当这些华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产时，大多选择了东郊的士嘉堡（Scarborough）地区。来自加尔各答塔坝华人社区的客家移民陆续在这里定居，该地区因加尔各答客家人聚居人数之多被称作“第二塔坝”。目前多伦多已经有一万多名从印度移居来的印度华人，超过了目前加尔各答的华人数量。笔者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时，曾问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认同，大多数受访者在回应时都提到自己的印度出生地、华裔身份和加拿大国籍，这构成了独特的“三重认同”。对于其中的“印度认同”，一些人仅将其与出生地联系在一起，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还包括了自己对印度美食和电影的喜爱，以及能说印度语言。也有一些受访者不愿主动与人提及他们是从印度移民至加拿大的。加拿大的印度华人群体仍通过建立文化协会、实践内部通婚、推广印式中餐，以及与居住在印度的亲属保持联系等方式，来保持他们的独特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

^① Ellen Oxfi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p.251.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华人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加强了与驻地中国使领馆的联系及国内的沟通，并为日益增多的中国学者的文化考察及学术交流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和支持。在中国的国庆庆典和世界华商大会上，多次出现了印度华裔的身影。在中国的IT等科技企业和英语培训等教育机构中，也可以见到年轻华裔印度人施展才华的场景。

五、结语

华人移民在印度聚居并形成社区的历史已有200多年，作为移民主体的广东人和客家人分别成为加尔各答新娘市场和塔坝两个华人社区的建设者和主要成员。华人社区设立的会馆、宗教场所、华人学校，以及沿袭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等，为保留他们的亚族群文化基因和华人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人移民通过他们多种类的商业活动，为当地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他们虽然大都保留了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中国与印度习俗混合的独特文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他们陆续离开印度再次移民海外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携带着这种兼具中印文化元素的混合认同。

如今只有塔坝的华人社区被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这里的客家人后裔大多仍然沿袭传统，以独特的方式过着半封闭式的生活。制革厂厂房改建的华人餐馆成为“塔坝唐人街”的新地标。移民至加拿大的印度华人在多伦多的士嘉堡形成了更大的印度华人社区，这被认为是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延续。如果说从事“不洁”制革业的塔坝使华人将自己与印度社会相隔离，那么印度政府和社会对华人融入印度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所设置的阻碍，无疑也加深了这种隔离。因此，将印度仅作为自己出生地看待的认同方式，是加尔各答和多伦多的印度华人在描述自己多重文化认同时较为一致的共识。

陈志明指出，“研究民族性的方法是看个人如何在民族上认同自己，然后研究他们如何在文化上表达民族认同，换句话说，人们如何利用文化特征来表达民族认同”^①。中印两国的历史进程及其政治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中印两国关系的变化，对华人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份、地位及生存环境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经历了从华人、外国移民、无国籍移民，到成为华裔印度人或印度华人的身份转变。对于祖辈在印度生活了一两百年的华人移民后裔来说，他们身份中的“印度”一词通常是指他们的出生地或国籍，而不是他们在印度当地社会中的同化或融合。这个有着特殊经历与混合身份的群体，在中印交流史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作为中印两国现代交流的亲历者和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他们值得被更多人关注。

① Chee-Beng Tan,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